

——  
五四文学传统与俄罗斯文学

# 历史 的文学

文学的历史

赵明◎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1340283

# 历史 的文学

## 文学的历史

赵明◎著



淮阴师院图书馆 1340283

——五四文  
传统与俄罗斯文学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文学与文学的历史：五四文学传统与俄罗斯文学/赵明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5

ISBN 978-7-227-02546-7

I. 历... II. 赵... III. 新文学 (五四) — 影响因素 — 俄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5546 号

---

历史的文学与文学的历史

赵 明 著

---

责任编辑 吕 棣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62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2546-7  
定 价 29.8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绪论 文学的民族接受与中国新文学的“他者”视野·····	(1)
<b>第一章 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b>	
——五四新文学的“前夜”背景·····	(8)
一 华夏文明与“长城”心态·····	(8)
二 内忧与外患：近代中国的危机形态与应变方式·····	(10)
三 近代文学的生长环境与“他者”视野·····	(13)
<b>第二章 重返历史的勇气与“阳谋”</b>	
——“文学革命”的诞生方式和逻辑图景·····	(21)
一 “文学革命”：近代意识的逻辑发展·····	(21)
二 “文学革命”的诞生方式与发生学意义·····	(25)
三 “文学革命”的展示模式和逻辑图景·····	(34)
<b>第三章 有形的历史与无形的现实</b>	
——五四文学传统的内质与张力·····	(52)
一 文学变革的内力与外力·····	(52)
二 五四文学传统的生成与延展·····	(61)
三 共时性与历时性：五四文学传统再认识·····	(71)
<b>第四章 “别求新声于异邦”</b>	
——中俄文学关系的发生学意义·····	(83)
一 “拿来主义”与“他者”视野：难堪的文学新现实·····	(84)
二 从欧美到苏俄：游动的文学热情·····	(95)

三	文学与革命：苏俄方式的逻辑模式和范本意义·····	(102)	
四	俄国文学：“建设”新文学的范本·····	(112)	
<b>第五章 猫爪子底下唱歌的夜莺</b>			
	——历史夹缝中的五四小说家与俄国文学·····	(128)	
一	历史愿望、文学审美与小说功能·····	(128)	
二	“问题小说”里的问题和模式·····	(137)	
三	乡土与写实：亦步亦趋的小说实践·····	(144)	
四	浪漫与抒情：小说里的人生模式和情感方式·····	(150)	
五	鲁迅：超越启蒙的生命体验与孤独的文学之路·····	(157)	
<b>第六章 他山之石，可否攻玉</b>			
	——中俄文学关系的影响范式与接受模式·····	(169)	
一	托尔斯泰：传统良知、道德楷模与文学吁求·····	(170)	
二	屠格涅夫：个体情怀、使命意识与抒情模式·····	(177)	
三	契诃夫：功利与审美的双重效用·····	(186)	
四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肢解、难排斥的文学巨人·····	(195)	
五	高尔基：镜子里的自画像·····	(207)	
<b>结语 历史的终结与文学的起点·····</b>			(226)
<b>主要参考文献·····</b>			(232)
<b>后 记·····</b>			(234)

## 绪论 文学的民族接受与中国 新文学的“他者”视野

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列宁

历史无法逃避其本身的进程。因此，它将一直被人重写。随着新的当前出现，过去就成了一种不同的当前的过去。

——约翰·杜威

在世界文学史上，文学的民族影响和接受是一个重要而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欧洲文学与古希腊罗马文学、日本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都说明了文学交流中特定历史阶段这种现象的存在。今天，人们无论探寻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或是研究民族文学的演变历史，都无法回避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任何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因素外，都无法回避“他者”存在的事实，都离不开关于“他者”的视阈。而且，某种基于“他者”想像自我的方式，往往成为文学交流中一个既定而特殊的思路，甚至成为文学发展的另类传统。

一般而言，中国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刺激、影响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中，俄罗斯文学（包括苏联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情有独钟，也是事实，上述问题也已经成为定论。但是，问题也许就出在这“情有独钟”上。在世界文学史上，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这种独特性，其一，表现为它某种意义上的超文化特性：在世界文学交流史上，文化的同质现象，即相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接受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在中俄文学关系中并不典型，虽然俄国是一个“兼有亚洲式的心理和欧洲式的文化”<sup>[1]</sup>的国家，但文化传统毕竟与中国文化传统存在相当的距离。其二，中国新文学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就其基本倾向和总体特征而言，存在着群体意识的功利

性色彩和个体审美的隐蔽性特点，这使得中俄文学关系与其他民族文学的关系相比较，更加凸现着某种“需要层次”。诚然，一个民族或一个作家，将别一民族或另一作家的文学“拿来”，不可能是缺少需要层次的，但中国新文学对俄罗斯文学的“需要”，其范围、层次、深度都是世界文学中所罕见的，这就造成了文学评价中的一个难点：每每评价中国新文学时，你不得不把它们与历史、现实、政治、思想、道德，甚至文学得以存在的相关载体联系起来考察，非此，你或者什么也说不清，或者只能做一些看似有用实则毫无意义的研究。其实，现代作家留给后世的，并不仅仅是有形的文本，还有那隐藏于文本之后的“本事”与“文心”，那贯穿于社团、流派之争中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心态，以及面对世事和文事，时而慷慨、时而欲言又止的难堪。后人在评说他们时，往往难免陷入情感与理智的漩涡：或者无理苛责，或者无谓钦佩。某种数落或辩护的心态，常常成为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这种分野实际上归结于一个至今尚无定论的逻辑难题：如何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用何种标准、尺度或价值体系去衡量现代作家。评价文学自然应该用文学的标准，但姑且不论对于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我们的评价系统往往随时代变化而多少有些游移不定，或者理念是确定的，操作却似是而非，即使在已有的现代文学评论中，要么是远离文学本体内涵的标签式结论，要么是抛开历史本事的文学神话的虚构。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静不下心来，或者冷漠地扣帽子，或者激动地唱赞歌，好像对那一代人的评价于人于己都关乎原则问题，属于性命攸关的大是大非问题。这种使评论者高度对象化，又使评论对象高度主观化的批评模式，总使人有一种雾中观花的感觉。之所以强调这些，其原意并非只是责难他人的研究工作，而是想说明，笔者在选择本论题时也存在上述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因为难保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先行声明，立此存照。

人们时常为中国新文学喝彩，因为与中国古典文学相比，它毕竟是历史的新声，毕竟开创了一个文学新纪元。但是，人们为先驱者高唱赞歌时，很容易忽视或原谅他们的幼稚与莽撞；人们也时常贬低中国新文学，因为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相比，它毕竟显得稚嫩，毕竟缺少点什么，即使与中国古典文学相比，它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尤其当人们回顾历史时，忽然发现某些传统性的东西已了无踪影，而这个源头正是新文学的开端……这些评价或要求其实源于一个常识性问题：当我们欣赏某一个人时，很可能以他为标准去要求另一个人，文学批评中这类现象也是经常发生的。上述问题意识或评价倾向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下列两个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判断：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性和世界性问题。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性相比，20世纪中国文

学的经典性某种意义上是要大打折扣的。虽然许多人都在热心为它划定经典的范围，但要证明这种经典性，也许不是认识态度或情感选择的问题，而可能是个时间问题；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意义，虽然不能否认它在思想层面上引起过世界的关注，也不能否认鲁迅对于世界文学史的经典意义，但是，总体看来，在审美层面上，很难说它比中国古典文学更具世界意义。因此，学者们主张，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评价必须建立一个恰当的坐标系：以“民族—世界”为横坐标，以“个人—时代”为纵坐标的评价系统。而且，在这一系统中，必须将20世纪中国文学置于以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为纵向，以20世纪世界文学为横向的两大背景中加以考察<sup>[2]</sup>，以此确定它恰当的位置。这当然是合适的评价系统，但有了这样一个坐标系，并不等于就能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脉搏和审美特征。至于是否能使我们变得客观与平和，仍是一个值得谨慎对待的问题。

历史的特性之一，在于它的无法还原性。既然历史是无法还原的，人们也就始终看不到历史发生瞬间的原生态，人们看到的，只不过是历史发生的结果。然而，对一切事物的“发生学”兴趣，对“历史”和“知识”的渴求，对“规律”和“真理”的追寻，又几乎成为人类的历史本能，变为某种持久、固执的信念和动力。这种动力又不时将人类的目光拉回到历史发生的原生状态中去。但是，迄今人类对历史所建立的认识模式中，最重要也最实用的方式，无非是由历史结果去推断历史发生的缘由。这其实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它很容易使历史推断者的主观意向强加或附着于历史本身，这样被解说的历史也往往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欺骗性，而且，也难逃历史本身被遮蔽的危险。惟此，历史研究经常提倡一种辩证的历史观。然而，所谓辩证的历史观或者“历史地”看历史，在实践中又是个极易标榜而不易操作的方法。所以，人类的“历史知识”和由此总结的“历史规律”不仅多如牛毛，而且也只能永远被赋予“我”的色彩，成为历史解说中一道公开的难题，成为主体性架构中极难逾越的障碍。对于本论题而言，这同样是个显而易见的方法论难题。对此，笔者找不到更“科学”的方法，似乎只能照葫芦画瓢，挪用换汤不换药的“伎俩”：走近历史（当然想“走进”，只是没有穿越时光隧道的本领），触摸历史，感知历史的脉搏，走出历史的巨大暗影。这其中又隐含着难易对等的两个问题：其一，对于文学研究，让历史开口说话，也许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与文学史相关的文本和事由都将成为鲜活的材料，它们能够帮助我们去寻找文学史发生的原生形态、演进线路及逻辑思路。但是，其二，走出历史，需要的却不仅仅是勇气和方法，而是有赖于论者在多大程度上把握文学的本体特性，有赖于论者确立何种价值尺度和评判



标准，不仅有效衡量“过去”的意义，而且说明这个“过去”对于今天和未来的意义，对于文学自身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上述方法论问题之所以既困难又重要，还在于，关于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尤其是中俄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学术界许多人都在努力做或者已经做过的课题。但是，如果我们承认任何研究都有其局限性，那么以往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关于中国新文学与俄罗斯文学关系中影响事实的梳理，近年来已基本得到廓清，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工作。但是，文学交流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些影响的事实层面，那么我们最多只能不断得到关于文学史的若干“知识”，而很难获得关于文学发展的本体要求、内在思路、运作机制和接受模式等方面的问题意识，这些又与比较文学研究寻找文学发展规律或者解决普遍问题的要求相背离。因此，对于中俄文学关系，重要的也许不仅仅是事实，而是隐藏于事实背后的东西，比如民族心态、民族的历史愿望和现实需求、作家个体的接受心理和审美需求以及群体愿望等等。正如佛克马所指出的那样：“俄国小说的广泛流传向中国广大读者揭示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和文学表现手段。俄国文学所表现的主题，以及表现这些主题的手法，都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俄国文学也影响到中国现代小说的形式结构。因此，要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就需要进一步认识俄国文学的影响。”<sup>[3]</sup>然而，这种“进一步认识”的可能性和路径，在以往的中俄文学关系研究中，大多存在于事实的梳理而少有文学规律的探寻，即俄国文学因何为中国文学“情有独钟”？这期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中国新文学和现代作家的选择路径及原则是什么？其中又隐含着怎样的民族心态和个人情怀？中国新文学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是在何种期待视野中完成的？又形成了怎样的接受模式？等等。依笔者愚见，这些问题才是中俄文学关系研究中的“真问题”，因而对它们的探讨将成为本论题努力的方向。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接受美学无疑曾经提供了一种极有价值的评价方式。它以文学的个人接受为研究对象，充分尊重文学接受过程中的个人性特点，重视接受者的气质、性格、兴趣、修养、学识、经历、需要和社会地位等诸种要素的综合作用，为文学史的重写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思路。但是，任何文学交流的发生，与其说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不如说更有意义地存在于群体意识和民族需要之中，即文学的个体影响与文学的民族接受是文学交流中同等重要的问题。对于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而言，这一点也许更为重要。这种重要性的理论意义和方法实践，在中俄文学关系研究中其实已被较早提出过<sup>[4]</sup>，但是，似乎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俄国文学以何种方式进入中国，表面看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其实却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在

中俄文学关系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关于“他者”的普遍视阈，事实上存在着个体接受和民族接受两条线索。它们并非只是各自孤立的两条平行线，而是时而相交，时而分离，时而重叠，其中隐含着某种历史愿望，凸现着某些现实需求，又或隐或现地昭示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个人良知和审美情怀。它们共同形成中国新文学在接受外国文学时不得不遵循的某些价值尺度和接受模式，它们凸现着文学参与历史的法则，它们传达出文学接受在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个人、审美与非审美诸种交汇点上的复杂局面，它们有效地促成了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形成和延展，从而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许许多多值得珍视的东西。当然，它们也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更多令人深思的问题。

今天，当我们试图回眸百年中国文学时，的确必须时时面对诸多令人回味与深思的现象与问题：人们惊讶于它的辉煌成就，也不得不承认它在某些方面的贫弱；它于腥风血雨中走出，带着激昂与慷慨，但又为其所裹挟，难得从容与镇定；它义无反顾地挣脱传统的樊篱，像个顽皮的孩子任性而洒脱，却于成长过程中不时暴露出先天的营养不良；当它冲出“铁屋子”的刹那，外面的世界精彩而又炫目，它几乎是饥不择食地“拿来”，从未想过它柔弱的肠胃是否承受得了。惟此，先天的营养不良与后天的消化不良使它走起路来多少有些摇晃。而惟有一样东西它自始未变——有朝一日成就缪斯的伟业——它后来被简约为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只可惜这样一种不无厚重的情结，在 20 世纪末以那样一种方式了结，多少让中国人既兴奋又尴尬，既满足又无奈。总之，好像某种神圣的情感、某项伟大的使命、某个高远而艰难的目标顷刻间实现后，摆在你面前的，反倒是滑稽和荒谬。凡此种种，都使我们有理由去推测，中国新文学在其不无辉煌的表象之下，是否隐藏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隐衷？尤其新文学的先驱者，是否以理性的目光审视自身的传统和“他者”的范本意义？他们对文学不朽大业颇为规范化的设计，是否真的就无懈可击呢？之所以如此无理诘问，盖缘于，无论今天我们以何种态度或方式去对待百年中国文学，我们都无法回避它留下的传统，它们甚至以某种更加隐匿的方式留存于我们中间。也惟此，当我们不断宣告要“重写文学史”时，我们是否该真的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回到从前，看看先辈们究竟怎样预设和创制了我们的新文学！笔者平日关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又于中俄文学关系略有心得，因而欲步方家后尘，借此回眸新文学传统中来自俄国文学的因素及其变异，算是对百年中国文学的一点私人敬意。

需要说明的是，本论题所谓“五四文学传统”，并非只是“五四”时期

的文学传统。对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它显然应该被看成一个既具有特定内涵又包含某种广延性的命题：第一，它是关于五四文学传统的，因此对中国现代文学带有整体性考察的思路；但它同时又是关于五四新文学传统形成期的，因而有一定范围，即本论题主要以新文学头十年的创作为考察对象；又因为它论述的是文学“传统”，所以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头十年，而需要以后来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倾向去加以印证。舍此，不能说明何以成为文学“传统”。第二，就影响源而言，本论题主要考察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对五四文学传统形成期的影响，而不是 20 世纪苏联文学对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影响。虽然在中国新文学的外来影响中，苏联文学也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课题。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期待视野和接受模式中，二者虽有区别，但更主要的是在某种意义上的联系，是彼此促进而又泾渭分明的。但是，这一课题的研究，无论是资料搜集或是学养储备，都是笔者目前无力承担的，因而只能舍弃。另外，即使 19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除了文学观念和理论，本论题主要考察的文体是小说而不是其他体裁，虽然诗歌和戏剧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同理，对于新文学的考察也主要以小说创作为主。这是基于下列事实和逻辑的考虑：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及其成就，以小说这一文体最为充分和完备，值得分析的文学现象更多，也更重要；同时，所谓俄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除文学观念外，主要体现于俄国小说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影响，并由小说的文体意识上升为文学的整体意识，从而形成某种文学传统。因此，无论影响的广度或是深度，无论影响产生的背景或接受发生的具体层面，无论思想需要或审美情怀，无论文学观念的形成或是具体创作的借鉴，小说无疑都是一个突破口，一个合适的、有价值、有意味的对象；而且，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走向式微，现代主义文学纷起争雄的局面中，19 世纪俄罗斯小说以其世界性声誉和经典性范本进入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视野，的确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特别是小说艺术的发展。因而，无论是当时或是现在，俄国小说无疑都能够承担一种（而不是惟一的）价值判断体系，从而为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和未来前景提供某种价值和意义的载体。由此，这一研究思路和上述问题意识在本论题中所欲建立的结合点与逻辑认识是：中国新文学是在某种非文学的状态下，在传统意识已被阻隔、外来思潮势不可挡的艰难局面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中外国文学的刺激和影响伴随其全过程，新文学接受外来影响的流程也经历了由欧美文学向俄苏文学的转移，并逐渐形成一种方向性变化。研究这种变化的逻辑起点与终点，廓清这种影响和接受的效果历史，重视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从而为重写文学史，为中国文学的当下发展和未来图景提供有意义、有价值的思路，理应是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注释：

- [1] 斯拉夫主义作家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语。转引自 [美] 赫德里克《俄国人》(下),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版, 292 页。
- [2]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一卷, 王晓明主编, 东方出版中心, 1997 年版, 5 页、19 页~20 页。
- [3] [荷] D·佛克马《俄国文学对鲁迅的影响》。见《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 乐黛云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279 页。
- [4] 王智量《论文学的民族接受》。见《俄国文学与中国》, 智量等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1 页~30 页。

## 第一章 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 ——五四新文学的“前夜”背景

中国人转过身去背对着海洋……中国只有在他人的逼迫下，才能重返历史。

——黑格尔

我辈手无斧柯，虽不能澄清国政，然有一枝笔在，亦可以改良社会，唤醒人民。

——李涵秋

#### 一 华夏文明与“长城”心态

在历史学家眼里，历史是由时间、事件和活动于其中的人所构成的意义世界；在政治家眼里，历史不外乎是王朝有序或无序的更迭；在文学家眼里，历史除了冷冰冰的“过去”和热辣辣的情、仇、爱、恨，其实什么都不是。然而，无论历史是什么，人们都以各自的方式描述和想像它。对文学家来说，寻找记录历史、想像历史的方法，几乎成为他们始终追寻的目标。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悲壮地实践着这一目标，企图使这冰冷的历史融入人的感觉，哪怕是鲜血和眼泪。惟此，当人们力图还原历史，追寻所谓历史的真相时，极力推崇历史学家陈寅恪“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无非说明了，文学中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具有“真历史”的价值。但是，对于20世纪的中国历史和文学，事实果真如此吗？

对人类而言，历史既公平又无情，虽然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人是历史的主体，但历史法则却时常使人自身陷入格外难堪的境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华民族，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法则的嘲笑声中被迫走向历史的前台。曾几何时，中国意味着世界的中心，意味着令他人羡慕的强盛与繁荣。多少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的统治者，总能以一种地球主宰者的超然感觉和君临天下的威

严风度对待自身以外的世界。广袤的地域铸造了他们不无宽阔的胸怀，自然也不知不觉地营造了一种沾沾自喜、自以为是的恶习。那些频频外出的使者，满载中国文明的果实，俨然和平使者般“环绕”了小半个地球，终于还是回到这泱泱大国，后人不禁要对他们外出的目的产生疑惑：这是认识外部世界的一种欲望呢，还是炫耀自身文明的一种手段？有一点至少可以肯定，他们带给王朝的，是“夷不如我”的答案和妄自尊大的心态。这使人觉得，即使他们的目的确是为了认识外部世界，兴许这目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个天大的心愿，即证明“华夏中心论”的确凿无疑。

也许他们过分炫耀了自己的荣光，也许这种文明果实的丰饶实在让人垂涎，中国历代统治者无一例外都受到过四邻的侵扰。但是，他们似乎从不认为这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或者发兵征讨，凯而旋之；征讨不利，被追求和，大不了赏赐财物，外加几个姿色未必出众的公主。久而久之，这几乎成了中国面对外部侵扰惯用的对策。当然，说中国人对愈来愈多的外部侵扰不加重视也许并不公平，因为从秦王朝起，中国人就筑起了“长城”，又经历代加固而绵延万里。这一事实在今天已被作为伟大的历史遗迹加以赞美，甚而被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所不同的是，其他七大奇迹尚属历史之谜，长城却不是谜，而是真实的历史事实。而且，随着时代的推演，它在成为中华民族伟大象征的同时，也不时幻化为西方世界想像中国的某种方式。然而，今人与古人对长城的心态并不等同：当我们不再需要它发挥使用价值时，我们尽可以充分颂扬它另类的审美价值；而在古人，它的使用价值却是第一位的：它既可防御箭弩飞射的小打小闹，拒敌于城墙之外，又将蛮荒隔绝于文明中心之外。而且，它所隐含的价值观，与其说象征了统治者固有的保守和不断加剧的恐惧，不如说它恰恰道明了一种永远置自我于世界中心的心态：华夏文明共三光而永光，蛮荒之人无权接近。它透出的依然是一种不慌不忙的王者风度。惟此，当我们不时赞美华夏文明的宏大、宽容和无限包容性时，我们也许恰恰忽略了它“王者”的特点：那里有充分的自信和威权，有大人不计小人过的胸怀，还有拒别种文明于千里之外的内在结构和外在气势。这种内在结构和外在气势既常常令统治者沾沾自喜，也使社会意识中的精英层面始终处于“夷不如我”的意识膨胀之中。久而久之，华夏文明与长城心态共同构筑了中国意识最核心的部分：一种故步自封、不思改变、稳居城中而难免坐井观天的历史理性；一种将自我与外部世界有效隔绝的实践理性。而中国意识的特性在于，在自身能够触及的范围内，它呈现出放射状，其有效边界正是心理“长城”。一旦到达这一心理边界，中国意识就自然而然地选择另一种延伸方式：纵向发展，高可升天，下可入地，终致“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由此，中国人认识世界和对待世界的方式

决定了，华夏文明的辉煌并非是大规模文化交流的结果，而几乎是一个独立发展的自足体，甚至外族的入侵和长期统治也无法改变它的特性。也由此，当这种文明历经千年演变而逐渐失去活力、走向衰落时，虽然它外在的气势已属强弩之末，但其内在结构的超稳定状态决定了，它依然主宰着民族的行为方式和心性结构。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自近代以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仁人志士，因其强烈的民族复兴愿望而向民族文化开战，甚至达到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决绝程度。而且，那种毅然选择域外文化冲击本土文化的激烈方式和鲜明态度，多少让后人既钦佩又有些不明就里，而那种激烈态度即使在今天也难有人望其项背。这种态度和方式的直接结果是，本土文化中最核心的所谓“中庸之道”至少从外在情形看，似乎已成衰败之势，而其内在结构却未必遭到严重破坏而荡然无存。问题是，这种向“祖宗”开战的行为方式和认知模式，突然将中国文化带入了一个未及准备的崭新天地，那里有希望、热情和剑拔弩张的氛围，也有大厦坍塌后的混乱、无序和各自为政的局面。这一切的一切，在历经百年沧桑后的今天，依然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疑点。而且，人们对其赞美之声与苛责之辞此消彼长或彼消此长，是否正说明了，那一代人的愿望和志向于今并未完成，那一代人的痛苦和疑惑却仍在延续呢？

## 二 内忧与外患：近代中国的危机形态与应变方式

虽然在历史学家眼里，所谓历史从来都以自己的方式不断延续和发展，但对中国历史而言，晚清以来的确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同于昔日的历史情形。无论历史演进的方式，历史局面与状态，或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生存方式和认知模式都较以前大为不同：统治者和统治意识中的“王者”风度自19世纪中期以后变得愈来愈不从容。1840年，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长期的、较为稳固的社会结构和形态开始发生变化，历史教科书上通常称之为“由封建社会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基于社会性质的描述也许在说明这一时期社会外部特征上的确有独到之处，但兴许也掩盖了社会内在结构中的许多“真问题”。比如，与历朝历代不同的是，清王朝所面对的不再是冷兵器时代箭弩飞射的小打小闹，而是“船坚炮利”的强力轰击。这个显而易见的冷酷事实，使得清王朝再也无法仅用少许财物和女色来保证王朝免受侵扰，而是面临着割地赔款、王朝覆灭的危险。惟此，清王朝最大的遗憾也许该责怨汉人的老祖先为何不拦海筑起一道海上长城，而仅仅使长城向海中伸出一个头。长城的实用价值原本是防止外患，清王朝所面对的却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外患。这种不断加剧的全方位外患仿佛突然来自太空的巨大陨石，一次又一次击

打着这位睡眼惺忪、摇摇晃晃的巨人。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无法抵御的外患使得中国的帝制结构自外部开始出现裂缝，王朝的延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统治者经常面对的，是一系列以割地、赔款、开埠、通商为基本内容的不平等条约。后人在分析那段历史时，也常常以此作为清王朝卖国的确凿证据。其实，外交史上原本极少所谓真正的“卖国求荣”，只不过，人们得给历史一个合理的借口，需要有人对历史负责，于是便有了许多恶名远扬的历史罪人。或者，“卖国求荣”作为效果历史也许能够成立，而主观意愿上，恐怕没有哪个统治者会“卖”自己的“国”。真正的问题是，在那样一种历史境遇里，在某种给定的条件下，在所谓“弱国无外交”的现实情形中，历史、国家、民族、个人大都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余地。清王朝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宣战、失败、谈判、割地、赔款、开埠、通商……除了留下个把英雄壮举外，王朝的威风像八旗子弟的骑术一样日渐衰微，而为后人所诟病的“历史事实”却平添了许许多多。历史发展到这一步，的确出乎统治者意外。中国是个凡事遵循祖训的国家，既然任何一位先哲都未曾预料到“船坚炮利”的厉害，清王朝无典可数，自然只得自己想办法。因此，实施有限度的“变法”成为统治者不得已而为之的救世良方。然而，他们选来择去，好像也只有“以夷制夷”的办法。可惜这样的“师夷之长技”非但不能“制夷”，反倒平白丢失了大片国土，落得自身难保，仓皇出逃……

然而，对清王朝来说，列强的欺辱尽管令他们难堪，但并不令他们特别害怕，真正令他们恐惧的是另一些事情：1843年6月，就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刚满一年，洪秀全在广东花县创立拜上帝会。同年，重修的《大清一统志》完成，但此后，“一统”的大清王朝遇到了比“外患”更具破坏力的“内忧”：来自民间的反抗和起义像国人脑后的辫子一样久拖不“绝”，终于在1853年3月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而达到高潮，并自此与清王朝对峙达11年之久。在世界历史中，每遇内忧与外患，选择“攘外必先安内”也许对统治者来说只是个政治常识，但在中国，可能还有其历史传统和思想资源的有效支撑。我们是个“家”天下意识很浓厚的民族，生为小民，爱国如爱家；生为皇帝，则视国如己家。前者豢养着臣规和奴性；后者滋生着王道与霸气。但也难说二者彼此没有关联，否则就很难解释“打天下”、“坐江山”的心理定势。惟此，清王朝的对外软弱与对内残酷镇压，“太平天国”打天下时的勇敢与坐江山时的荒唐也就不难理解了。

统治者无用，下层民众造反，如此内忧外患的国情，知识分子的思想 and 行踪怎样呢？

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主张抵抗和禁烟的林则徐、邓廷桢



10月即被清政府撤职。年底，林则徐作《庚子岁暮杂感》诗4首，表达他对时局的关切和自身壮志难酬的悲凉情怀。1841年，主张“经世致用”，提倡“更法”、“改图”的晚清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逝世。1842年末，魏源完成《海国图志》50卷本初稿，并于1852年定稿为100卷本。魏源自述《海国图志》“为以夷制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同是1842年，32岁的曾国藩在京广交文人学者，并对“不甘居于庸碌者”的“有志之士”大为赞赏。1843年，穷书生洪秀全巧借西洋人的“上帝”创立了“拜上帝会”，并于两年后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创立一种以朴素的平等思想为内容的农民革命理论。1853年，《天朝田亩制度》颁布。1854年，44岁的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声言“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sup>[1]</sup>1855年，62岁的魏源隐居杭州，参禅静坐，谢绝宾客。1857年，这位较早放眼看世界的近代启蒙思想家谢世。1861年，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发表，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较早提出变法改良思想。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奏请朝廷派留学生出国学习，为洋务运动培养人才。1872年，曾国藩逝世。1883年，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在香港刊行，鼓吹兼采西学，改革政治，变法图强。1889年，西太后“归政”，光绪帝“亲政”，清廷“帝党”与“后党”展开夺权斗争。1891年，34岁的康有为由北京回到广州讲学，为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做舆论准备。1893年，郑观应编撰完成《盛世危言》，并于次年出版。郑氏指责顽固派“立古而非今”，批评洋务派只学西方科技而不事政治改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属“逐末而忘本”，明确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倡导“富强救国”。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创立“兴中会”。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5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实施“公车上书”，要求变法图强；8月，强学会在北京成立，发行《万国公报》，宣传变法维新。同年，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4篇政论文，主张废除八股文，改变专制制度，实行变法维新，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1896年，清政府第一次派留学生赴日留学。1897年10月，梁启超、谭嗣同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为变法维新培养人才。11月，康有为在北京结成粤学会、知耻会，为变法救国大造声势。1898年4月，张之洞《劝学篇》发表，指责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抨击变法维新思想，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月，严复译《天演论》木刻本行世。6月11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决定变法维新。7月25日，清政府颁谕：“张之洞所著《劝学篇》，持论平正通